

法用于临床的愿望等。这时医生就容易偏向于根据自己的愿望判断医疗检查的资料，决定诊断（因果论分析）和治疗方案，而诱发医疗事故的可能性也就变高了。这就是医疗医学中典型的将目的论与因果论相混同的错误。这种情况下，医生对患者进行“公开信息”、“责任说明”和“对话”等三种“验证程序”，必要的时候征求“第二者意见”，避免过失或者将过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可能性就会出现质的提高。

不仅是医疗和医学领域，在以人为对象的各门科学中，因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各自追求的目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状况“不确定性”普遍存在。就是说研究者、研究对象间的“共同主观性”导致了状况的“不确定性”。而“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对话”等“验证程序”，才是避免由此造成研究者的判断失误、提高“认识客观性”的有效方法。

#### (8) 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别称——“地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前所述，近年日本的中国现代研究通过中日间的学术交流在实践性上得到了发展，除一部分以建议的形式参与了日本政治经济界对华政策的决策、修正和实施，这种带有现实目的的研究比比皆是。

带有现实目的就是指，根据在研究对象中国进行的实地调查、访谈、文献收集等获取的信息资料，对中国的现状进行诊断（因果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向中国决策当局提出建议或者像日本社会各界提出政策上的具体“药方”（如同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对于研究者来讲，学术研究成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对中国的现状采取诊断与提出政策（治疗方法和药方）这两种形式。

如此而言，旨在防止出现研究错误的“验证程序”，即“信息公开”、“责任说明”、“对话”应该是必须针对研究对象，也就是诊断对象的中国社会各界，以及对华政策的治疗方法和药方接受者日本社会各界。因为中日两国社会都是这种研究成果导致的利害关系的承担者。

实际上，现代中国学领域对研究的诊断对象中国社会各界的“验证程序”决定性地被轻视，基本上没有得到实行。“验证程序”只是针对日本的学术界内部，也就是对华政策药方的接受方日本社会各界。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日中交流合作而出现的高度务实性研究中，在对中国当局的改革政策提供建议的同时，依然看不到对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采用“验证程序”的积极姿态。

这种缺陷不仅仅在现代中国研究里，在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日本学术界一般将发展中国家研究称为“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sup>53</sup>而不是“外国研究”。这个称呼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哈佛大学的J·K·费正清（Fairbank）和唐·麦克（Don Mckey）组织了“国际、地区研究专门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并以此创设了称为“地区研究”的研究领域而得名的，日本学术界延用了这种称呼。<sup>54</sup>

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要对研究对象的外国社会采取应该采取的“验证程序”这一弊端，只限于“地区研究”之中。“地区研究”的范畴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同样是外国研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却不在此列。就是说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与“地区研究”相比，采用的“验证程序”相对更多。

从明治维新进行现代化直至昭和期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学术界一直持续着仅仅“由横变竖”（将文字横排的欧美文献翻译成竖排的日文）就被承认为学术成果的状态。就是说在翻译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后，对其进行事实上的“剽窃”，将其据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予以发表的事情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这种状况是日本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尚不像今天这样频繁的时代产物。就是说欧美各国学术界存在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日本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并不清楚，才导致了“由横变竖”式的研究也能横行一时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以欧美各国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的“外国研究”当然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欧美各国进行“信息公

开”、“责任说明”、“对话”。

但是到了战后，特别是60年代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日本留学生大量增加，以及伴随着资本自由化而逐渐增加的人才的国际流动，日本与欧美各国在学术方面的交流急速增加，上述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欧美学术界的既存学术成果基本上已经像今天这样，被日本学术界所熟知，与此相应，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被欧美学术界了解的情况也逐渐增多，“由横变竖”的剽窃式研究慢慢就不再通用了。这时日本人的欧美研究当然也就被要求对研究对象国的“验证程序”了。这一点在日美间的学术交流中最为明显。

而在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地区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日本的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并不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此造成了容忍像过去欧美研究中出现的“由横变竖”（在中国研究里就是将汉语翻译成日语）式研究横行的局面。现代中国研究也不例外。但即使同样是“由横变竖”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欧美研究中的这种弊端和“地区研究”领域中的弊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当时的欧美研究是以欧美的学术水平高于日本为前提的，而“地区研究”则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水平视为低于日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剽窃式的研究。

#### (9) 中日两国教育和研究交流中的问题：学术教育领域的分层性

到了今天，随着国际间人才流动的频繁，尽管欧美研究特别是日美研究交流中“由横变竖”式的剽窃性研究已经难以容身了，但是在“地区研究”领域中，这种剽窃性研究仍然有一定市场。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研究者看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水平，并倾向于不承认在其研究中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说，由于并没有认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与自己的研究处于同一水平之上，所以不是将其视为学术性的参考和探讨对象，而是作为信息资料般的研究材料，并随之根据情况不自觉地进行“剽窃”。这一点在日本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留学现状中也鲜明地反映了

出来。

包括中国在内，抱着学习和取得学位目的赴日留学的发展中国家留学生近年来快速增长，尽管如此，以同样目的留学发展中国家的日本留学生却少之又少。<sup>55</sup>就是说，尽管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与物的国际交流非常频繁，从留学的角度看，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摆脱单向流动的性质。

同样的情况当然在学术交流中也有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各个领域的很多日本学者前往中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为那里从事日本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举办关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讲座或者有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种理论的讲座，从事研究交流活动。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还没有培养日本学人才的完善系统的情况下，这些讲座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可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交流访问，几乎所有的讲座都是没有翻译而直接用日语进行的。<sup>56</sup>

反过来看，中国学者被邀请到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举办讲座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通常都是被要求带有翻译的。特别是一年以上以举行讲座和讲义为前提的中长期访问交流，被招聘的中国学者精通日语成为必要条件，而不会日语的学者往往就不受欢迎。

这种状况如实地反映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水准。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在其学科理论（discipline，学术工具、理论和分析的理论框架）上有一种强烈的偏向，就是并不期待通过与中国的学术交流产生相互影响。比如对于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各种问题的学术性分析和见解，被认为与其他类型的中国信息一样，仅仅是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资料，此外没有其他的意义，看不到学术和理论价值。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实际情况就是，其学科理论与其说是在日本学术界内部的讨论，不如说更倾向于吸收更多的美国学术界的议论。而且这不是本着日美两国学术界相互